

“工具人”话语的隐喻逻辑与青年劳动观念重塑

——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分析

张梦琪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7日

摘要

“工具人”作为近年来在青年群体中广泛传播的网络流行语, 折射出青年人在既定社会结构中的复杂工具心态和劳动观念变迁的话语症候。以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为分析框架, 考察“工具人”话语的隐喻逻辑及其对青年劳动观念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 “工具人”话语通过“人即工具”的本体隐喻、“劳动即工具性操作”的结构隐喻和“价值即功能性实现”的定向隐喻三重逻辑, 建构了一套将劳动者降格为工具、将劳动还原为功能实现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在深层结构上与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 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行为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形成理论上的呼应。在此基础上, 本文以马克思“创造性劳动”为价值坐标, 从确立劳动的主体性地位、澄明劳动的价值创造本质、重建劳动的共同体维度三个层面推进青年劳动观念的重塑。

关键词

工具人, 隐喻逻辑, 异化劳动, 青年, 劳动观念

The Metaphorical Logic of the Discourse of “Tool Man” and the Reshaping of Youth Labor Concepts

—Analysis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Mengqi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uly 26, 2026; accepted: August 17, 2026; published: August 27, 2026

Abstract

“Tool man”, as a widely spread internet slang among young people in recent years, reflects the discourse symptoms of the complex tool mentality and labor concept changes of young people in the established social structure. Using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etaphorical logic of the discourse of “tool man” and its impact mechanism on young people’s labor concept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discourse of “tool man” constructs a discourse system that reduces laborers to tools and restores labor to functional realization through a triple logic of ontological metaphor of “man as tool”, structural metaphor of “labor as instrumental operation”, and directional metaphor of “value as functional realization”. This discourse system corresponds to the four fold normativity of alienated labor revealed by Marx in deep structure: the alienation of laborers and labor products,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behavior itself,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theoretical formation of alienation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takes Marx’s “creative labor” as the value coordinate, and promotes the reshaping of youth labor concepts from three aspects: establishing the subjectivity of labor, clarifying the value creation essence of labor, and rebuilding the community dimension of labor.

Keywords

Tool Person, Metaphorical Logic, Alienated Labor, Youth, Labor Concep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打工人”“工具人”等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2020年11月8日,“工具人”被《青年文摘》评选为“2020十大网络热词”[1],此后持续活跃于青年群体的日常表达之中,形成了一个表达客体化的独立话语体系。青年群体是这一话语体系的重要传播者,并依托算法推荐技术、数据集成逻辑,致使该话语愈发成为影响青年价值判断的重要因素[2]。从词源学角度看,“工具人”最初是一个管理学概念,指完全被动接受命令、被当作工具使用的管理对象;而后经由网络游戏的场景延伸,指只需完成特定功能即可退场的角色,到最终泛化为对一切被工具化使用之人的自嘲式称谓。这一语义迁移过程本身即构成一个值得追问的理论问题:为什么当代青年如此频繁地以“工具”自喻?这种自我指认的话语实践折射出怎样的劳动观念变迁?

既有研究已从多个角度触及这一问题。有学者从职场物化的视角考察“工具人”流行语的社会心理效应,认为工作中被物化的个体缺乏人性,不仅表现得像工具,而且在客体化的情境中,人们通常无法表现得像一个完整的人[3];有学者以“牛马”话语为样本,揭示数字经济时代劳动主体性异化的现实困境,认为“牛马打工人”心态的来源是资本逻辑、社会流动与生活成本等多重压力叠加所导致的青年群体经济上的“挤压感”与对未来的“焦虑感”[4];还有学者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分析青年劳动幸福观的场域消解,认为“注重劳动中的幸福体验”的缺失导致个体对劳动价值、意义产生怀疑,导致青年在无意识中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性存在”[2]。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工具人”话语的社会心理效应或劳动异化后果的呈现,较少从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背景出发,分析这一话语生成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事实上,随着平台经济、算法管理和数据资本的发展,当代劳动异化已经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工

业资本主义的新形态。斯尔尼塞克在《平台资本主义》中指出,数字平台通过对数据资源、技术基础设施和市场连接方式的控制,成为资本积累的新型组织形式,劳动者虽然摆脱了部分传统科层管理,却被纳入平台规则和数据逻辑之中[5]。与此同时,算法作为新的劳动治理方式,通过任务分配、绩效评价和行为预测等机制影响劳动过程,使劳动者的自主性面临新的挑战。这意味着,数字时代的“工具化”并非简单表现为外在强制,而更多体现为平台规则、算法逻辑对劳动主体性的隐性塑造。

基于此,“工具人”话语不能仅被理解为青年群体面对职场压力的自嘲表达,而应被视为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关系变化的一种话语表征。它既延续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者被工具化的异化逻辑,也呈现出数字劳动时代主体性弱化的新特征。因此,有必要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基础上,引入平台资本主义和算法权力视角,进一步揭示“工具人”话语背后的生成机制。

2. “工具人”话语的三重隐喻逻辑

隐喻不仅是修辞现象,更是认知的基本方式[6]。当青年以“工具人”自称时,他们并非在进行精确的自我定义,而是在运用隐喻完成一种认知图式的建构,将自身、劳动以及劳动的价值纳入“工具”的框架中来理解。这一认知图式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隐喻逻辑。

(一) 本体隐喻:“人即工具”的身份定位

“工具人”话语最核心的隐喻操作是将“人”与“工具”这两个异质性范畴予以等同。本体隐喻的特征在于将抽象的经验实体化,在这里,“人”这一充满主体性、能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被转喻为一个可被使用、可被替换、可被评估效能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被视为纯粹的‘劳动工具’。”这一隐喻的认知后果是深刻的:它不仅在描述一种处境,更在定义一种身份。当青年说“我是一个工具人”时,他实际上完成了一次自我物化,将自己的主体身份置换为客体身份,将“我是谁”的问题置换为“我有什么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我物化并非完全消极:它同时构成了一种防御性的话语策略,通过主动承认自身的工具化处境来消解被工具化的屈辱感。但无论其心理功能如何,“人即工具”的本体隐喻都在认知层面为劳动观念的异化铺设了逻辑前提。

(二) 结构隐喻:“劳动即工具性操作”的意义重构

如果说本体隐喻回答的是“我是谁”,那么结构隐喻回答的则是“我在做什么”。“工具人”话语将劳动建构为一种工具性操作,劳动被理解为执行指令、完成功能、达成外在目标的手段性活动,而非劳动者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实践。这一隐喻结构将劳动的意义从“过程”转移到“结果”,从“创造”转移到“功能”。在“工具人”的认知框架中,劳动的价值不再内在于劳动过程本身,而外在于劳动所实现的功能,正如一把锤子的价值不在于它“是”锤子,而在于它能“钉”钉子。这种意义重构使得劳动的去价值化变得顺理成章:既然劳动只是工具性操作,那么劳动过程中的意义感、成就感、自我实现感便都是多余的诉求。“摸鱼”劳动态度的流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意义重构的必然延伸,主体意识强烈的青年人误认工作是以商品的形式将自己“卖身”给老板,不得不面临自我意识的破碎与重构[7],也就是说当劳动被还原为纯粹的工具性操作,劳动者自然丧失了投入其中的内在动力。

(三) 方位隐喻:“价值即功能性实现”的评价转型

方位隐喻涉及价值的空间化定向——好与坏、高与低、中心与边缘。“工具人”话语将人的价值锚定于功能的实现:一个人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他能否有效地发挥工具功能。这一评价标准的转型意味着,人的尊严、创造性、独特性等非功能性维度被系统性排除在价值评估之外。青年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工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被他们的雇主“像工具一样对待”,他说:“对于现代的工厂工人来说,对于妇女和儿童来说,这种自由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成了资本的奴隶。”[8]而“工具人”话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将这种外在的工具化对待内化为自我评价的标准,青年不再仅仅是被当作工具,更是以工具的标准来

衡量自己。这种评价转型使得异化从一种外在的结构性压迫深化为一种内在的自我认同，从而具有更强的价值观念效力。

3. 隐喻逻辑与异化劳动的理论同构

“工具人”话语的三重隐喻逻辑并非孤立的话语现象，而是在深层结构上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所揭示的四重规定性形成同构关系。这种同构关系意味着，“工具人”话语不仅是异化劳动的话语表征，更在认知层面参与建构和强化了异化劳动的精神条件。

(一) 劳动产品的异化与“工具性价值”的功能主义逻辑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其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9]阐明了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成为主宰劳动者的异己力量。马克思指出，劳动异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与劳动者相分离的必然结果[10]。在“工具人”话语的隐喻逻辑中，这一异化以“工具性价值”的功能主义形式呈现出来。当劳动被理解为纯粹的工具性操作时，劳动产品便被理解为功能的实现物，产品天然不属于劳动者。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本应有的那种“对象性关系”：人在自己创造的产品中看到自身本质力量、获得自我确证的关系被彻底置换为纯粹的“功能-结果”关系：劳动不过是为了产出某个结果，而这个结果与劳动者本人无关，体现在现有分配格局中，劳动者实际收入与产品交换价值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劳动者无法拥有或消费自己的劳动成果。由此出现了青年在“工具人”自嘲中流露出的“干多干少一个样”“成果跟我没什么关系”的心态，正是这种功能主义逻辑在劳动产品层面的具体表现。青年们感到自己像流水线上的扳手，拧完螺丝后，螺丝去了哪里、组装成了什么，都与扳手无关。也就是说，劳动产品作为人的类本质异化的产物，本应归属于工人，却被资本家所占有[11]。

(二) 劳动过程的异化与“去主体化”的程序主义逻辑

根据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劳动本该是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活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成为外在的、强制的、自我折磨的活动，劳动者在劳动中感受不到任何自主性和自我价值。“工具人”话语中“劳动即工具性操作”的隐喻，正是这一异化在认知层面的表达。当劳动被建构为纯粹的工具性操作时，劳动者的主体性包括自己作决定、创造性思考、赋予劳动以个人意义等能力便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劳动过程之外。劳动者不再是在“从事”劳动，而只是在“执行”劳动；不再是在“创造”什么，而只是在“完成”什么。这种“去主体化”的程序主义逻辑使得劳动过程沦为一种异己的、毫无个人意志参与的规定性动作。当代职场中“上班摸鱼”现象的普遍化，正是劳动者对劳动过程丧失主体性参与意愿的消极表达，也是用一种可控的、异化的自我满足方式来对抗外部社会压力，疗愈自身的“劳动创伤”[12]。他们认为既然怎么干不由我说了算，那我何必投入真正的情感和创造力？

(三) 类本质的异化与“功能化生存”的祛意义逻辑

异化劳动的第三重规定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发展的活的、动力性的基础”[13]。创造性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然而，“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4]，人不再在劳动中实现自己，反而在劳动中丧失自己。“工具人”话语中“价值即功能性实现”的隐喻，将人的价值锚定于功能的发挥，从而将人的存在方式从“自由全面的发展”降格为“功能的实现与消耗”。这种“功能化生存”的祛意义逻辑意味着人的全部存在意义被压缩为他在社会机器中扮演的功能角色，青年不再是“人”，而是“人力资源”；不再是“劳动者”，而是“劳动力”；不再是个体生命，而是可替换的零件。当青年以“工具人”自称时，他们实际上在表达一种深刻的生存体验：除了作为工具发挥功能之外，我找不到自己存在的其他意义。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其自身相异化”的当代话语形态。

(四) 人际关系的异化与“竞争文化”的孤立主义逻辑

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4]也就是说当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和类本质全面对立时，人与人之间也必然相互对立。“工具人”话语虽然表面上是自我指涉，但其隐含的人际关系维度同样值得关注。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 年职场人满意度指数调研报告》显示，在对职场人际关系的满意度调查中 21.2% 的人认为同事间的关系是钩心斗角^[15]。数据的背后隐藏的是竞争文化对青年劳动者的职场环境与人际关系的迫害。克尔伯格在思考竞争文化时指出，“当文化活动被内在化之后，对将其内在化的人来说，这些活动就常常显得自然不可避免，而且不可改变了。”^[16]在“工具人”的认知框架中，他人同样是功能性的存在，是可以被使用、被替换的“工具”。这种认知导致人际关系的彻底工具化和功能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基于共同劳动的情感联结、惺惺相惜，而是基于“你能为我做什么”“我能为我做什么”的“使用与被使用”关系。数字时代平台经济中劳动者的“人与人对立”状态，例如外卖骑手之间几乎没有真正的同事关系、彼此只是竞争接单的对手，还有“职场孤岛”现象以及青年社交中“人脉即资源”的功利化倾向，都可以在这一逻辑中得到解释。当每个人都将别人视为工具时，自己也注定只能被当作工具。

4. 异化劳动的扬弃与青年劳动观念的重塑

揭示“工具人”话语的隐喻逻辑及其与异化劳动的同构关系，最终目的在于探索青年劳动观念重塑的可能路径。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不仅包含“批判”的维度，更包含“建构”的维度。扬弃异化、复归劳动的本真状态，始终是这一理论的价值指向。在智能算法深度嵌入劳动过程、平台经济重塑用工关系的当下，异化劳动的扬弃已不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宏观命题，更与青年劳动者日常的主体性实践紧密交织。

(一) 从“工具性存在”到“主体性实践”：劳动主体地位的重新确立

重塑青年劳动观念的首要任务，是在认知层面打破“人即工具”的本体隐喻，重新确立劳动的主体性地位。劳动主体性的恢复并非只能依赖宏观制度变革，也可以通过劳动组织内部的微观调整逐步实现。例如，部分平台企业近年来开始尝试优化算法管理模式，通过公开配送规则、增加人工申诉渠道、降低单纯以效率指标评价劳动者的比例等方式，减少算法对劳动者的单向控制。这类实践虽然仍处于探索阶段，但说明算法并非天然意味着劳动异化，其关键在于算法设计是否充分考虑劳动者权益。

对于青年劳动者而言，也需要形成面对算法管理的主体性能力。例如，一些互联网劳动者通过线上社群共享劳动经验、交流平台规则、集中反馈算法问题，使原本孤立的个体劳动者形成弱连接式的协商网络。这种基于数字技术形成的新型劳动者联合方式，体现了数字时代劳动主体对技术逻辑的反向利用。马克思将劳动理解为“创造性劳动”，意味着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被动的执行者，而是主动的创造者；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然而在数字资本的运行逻辑下，算法将劳动过程拆解为可量化、可监控的标准化环节，劳动者被“数字监工”所支配，其自主决策、创造性思考的能力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劳动过程之外。

因此，劳动主体地位的重新确立，首先需要破除“技术赋魅”，使劳动者认识到技术仅仅是服务于人类意图的工具而非主宰自身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中，青年劳动者已展现出一定的主体性自觉。有研究指出，当代青年通过“技术反训”夺回产品控制权，在劳动产品被平台无偿占有的情况下，以数字留痕、技术申诉等方式重构对自身劳动成果的认同，这些实践虽然微观、零散，却构成了“扬弃”的现实起点，但它们表明青年并非被动承受异化，而是在日常劳动中尝试以隐秘的策略抵抗工具化的命运。劳动观念的重塑应当充分关注和吸纳这种来自劳动者自身的主体性智慧，而非仅仅停留于自上而下的价值宣导。

(二) 从“功能实现”到“价值创造”：劳动本质的重新澄明

“工具人”话语将劳动的意义锚定于功能的实现，从而遮蔽了劳动的价值创造本质。马克思指出，

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人确证自身本质力量、实现自我发展的根本途径。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语境下，这一本质被进一步遮蔽：平台通过“流量-数据”的唯流量导向，将劳动的价值窄化为可计算的功能指标，劳动者在“数据膜拜”中逐渐丧失对劳动意义的感知，沦为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单向度的人”。澄明劳动的价值创造本质，要求帮助青年重新发现劳动的内在意蕴：劳动不仅创造物质财富，更创造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关系；不仅是“付出”，更是“生成”。

部分青年在劳动实践中自发追寻的“心流体验”，为劳动本质的重新澄明提供了微观样本。研究表明，当代青年劳动者通过对清晰目标与即时反馈的重构、对时间扭曲中创新本能的释放、对积极情绪的自主延长等方式，在工具化的劳动场景中重建意义感与自我实现感。这提示我们，劳动观念的重塑需要为青年创造能够体验“心流”的劳动条件，这使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确证自身力量、获得深层愉悦的实践活动。在实践层面，这要求劳动教育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引导青年在劳动中感受创造之美、体验协作之乐；同时也要求社会破除“重脑力轻体力”等劳动等级观念，使每一种劳动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意义，让青年在多元化的劳动形态中重新发现劳动的价值底蕴。

(三) 从“单个个体”到“劳动共同体”：劳动关系的重新建构

异化劳动造成的人际疏离，在“工具人”话语中表现为“竞争文化”的孤立主义逻辑。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劳动从来不是孤立个体的私人活动，而是在社会关系中展开的共同体实践。数字时代平台经济的兴起虽然打破了传统科层制的束缚，却在“零和博弈”的竞争文化中将劳动者进一步推向了人与人对立、人的自我对立的境地。通过算法将劳动者分割为可替换的独立个体，劳动者之间缺乏稳定的协作纽带和情感联结，更难形成团结的劳动者社区来维护共同利益。这种竞争文化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异化为有限的资源争夺战，劳动者的社会联系被淡化，亲社会行为减少，最终陷入“人人都是彼此工具”的异化关系。

修复这一关系裂变，需要重建劳动关系的共同体维度。例如，在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劳动领域，劳动者开始通过微信群、论坛和线上社群分享劳动经验、讨论平台规则，并通过集体表达推动平台调整部分管理措施。这些网络社群虽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会组织，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信息共享、权益表达和情感支持的功能。同时，一些地方也开始探索平台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新模式，例如推动平台企业建立骑手服务中心、完善劳动申诉机制、提供职业培训和社会保障衔接。这些实践表明，劳动共同体的形成并不一定要求完全复制传统工业时代的组织模式，而可以结合数字劳动的新特点，通过制度建设与劳动者自组织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展开。

5. 结语

“工具人”并非一个无伤大雅的网络玩笑。当一代青年以“工具”自喻时，这一话语实践所承载的是对劳动意义、自我价值与社会关系的深层困惑。本文的分析表明，“工具人”话语通过“人即工具”的本体隐喻、“劳动即工具性操作”的结构隐喻和“价值即功能性实现”的方位隐喻三重逻辑，建构了一套将人工具化、将劳动功能化、将价值绩效化的认知图式，这一图式在深层结构上与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形成同构，由此，“工具人”话语不仅是异化劳动的话语表征，更在认知层面参与着异化劳动的精神再生产。在此基础上，本文以马克思“创造性劳动”为价值坐标，从确立劳动的主体性地位、澄明劳动的价值创造本质、重建劳动的共同体维度三个层面，提出了青年劳动观念重塑的理论路径。然而，观念的重塑终究不能替代制度的革新，“工具人”话语的生成有其坚实的物质基础，若缺乏结构性改革的支撑，观念层面的回应难免流于空泛。将青年劳动者日常的主体性实践转化为制度设计的资源，使宏观改革与微观实践形成良性互构，让“创造性劳动”从遥远的理想转化为青年在日常劳动中可以真实趋近的实践方向，是这一课题有待深入推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沈爱国, 王晓晴, 钟璐佳. 网络热词: 生成本质与意义流变[J]. 传媒评论, 2021(2): 49-52.
- [2] 陈曦, 岳磊. 青年劳动幸福观的场域消解与纾解路径——基于网络“牛马”话语传播的考察[J]. 浙江树人学院学报, 2026, 26(1): 37-45.
- [3] 傅晓琪, 贾淑怡, 何肖依, 等. 职场物化的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J]. 心理月刊, 2023, 18(9): 237-240.
- [4] 张静. “牛马打工人”: 当代青年劳动体验的出场语境、现实成因与破解路径[J]. 理论导刊, 2026(5): 131-140.
- [5] Srnicek, N.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Press.
- [6] 莱考夫, 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 何文忠,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 [7] 祖紫钰. 基于马克思劳动观视域的青年“摸鱼”劳动消解路径解析[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93-100.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640-641.
- [9]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1.
- [10] 张新.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异化的四重表征与扬弃路径[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8(3): 132-142.
- [11] 马松红, 赵旗娟. 数字劳动异化的成因及纾解路径[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5, 16(6): 13-18.
- [12] 沙君, 吴海龙. 祛魅与重构: 劳动观视域下青年“躺平主义”群像特征、缘由探赜及疏解之道[J]. 宁波工程学院学报, 2024, 36(1): 42-48.
- [13]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1卷[M]. 俞可平,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5] 智联招聘: 2024年职场人满意度指数调研报告[EB/OL]. 2025-04-25.
<https://www.sgpjbg.com.cn/baogao/490737.html>, 2025-05-03.
- [16] 迈克尔·克尔伯格. 超越竞争文化: 在相互依存的时代从针锋相对到互利共赢[M]. 成群, 雷雨田,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